

三江热议

对“减负”下猛药宜谨慎乐观

戴先任

既然每天15点30分提前放学,会把中小學生“让”给收费高昂、鱼龙混杂的教育培训机构,那么,学校为什么不可以提供更长时间的照看服务呢?毕竟,对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说,“管理”正规的学校,总比“管理”五花八门的培训机构要高效得多。2月14日下午,上海市教委大大方方地向公众宣布,曾经为50后、60后家长分忧的“晚托班”项目要重启了,原因是“减负需要”。

2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上海市教委此次向社会发布“减负”通知,连上海奥数数的“四大杯赛”都相继主动停办,为其“让路”。而在上海市“两会”后,上海市教委就对“四大杯赛”的举办者进行了约谈。因为上海不少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奥数,甚至出现幼儿园小班、中班的学生家长到某教育培训机构通宵排队“占坑”的现象。因此,上海市教委此次“减负”的决定显得很有必要。

此次上海市教委打出“减负”组合拳,如重启“晚托班”项目、通过指导上海民办中小学的招生评价等,来对家长、老师的教学进行引导。重启

“晚托班”项目,可为在校学生提供延时照顾服务,既能照顾到正常放学后按时离校有困难的学生,又给了家长和孩子一个“不去培训班”的理由,从而达到给孩子“减负”的目的,可说是一举两得。无独有偶,南京日前也要求学校为小学生提供“弹性离校”服务。两座城市的举措体现了对学生的一种兜底责任,值得各地借鉴与学习。

上海打出“减负”组合拳值得肯定,但能否“打”走学生身上的“重负”,笔者只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这些“减负”措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要想治本,最终还是要靠改革教育制度和重新构建高考评价体系来实现,从而改变唯分数论英雄、“一考定终生”的评价标准,让学校注重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当然,治标也能为治本争取时间,持之以恒地治标也能促成治本的早日到来,甚至可以起到逐渐治本的作用。退而求其次,就算上海、南京此次的举措只给孩子沉重的书包减少了一本书,对不胜负荷的孩子来说,也是莫大的“减负”。

街谈巷议



铲除艺考腐败唯靠阳光招考

张立美

眼下,全国各艺术院校自主招生陆续开考。一直以来,艺考都是招考腐败的重灾区,每年都有案件发生。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虽然多地在统一标准和加强考试现场监督方面进行了不少改革,但艺考招生仍存在漏洞。

2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毫无疑问,与其他教育腐败现象一样,艺考成为教育腐败的“重灾区”,背后必然存在利益链条,高校以及考官从中可以获得利益。除此之外,还与艺考制度本身存在漏洞有很大关系。

一方面,艺考的主观性更强,考生成绩完全由考官凭借个人主观看法打分,这意味着考官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就产生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另一方面,虽然许多艺术高校尝试从外面聘请艺考考官,甚至请胡歌这样颇为知名的校友当考官,但整体来说,艺考的圈子仍然比较封闭,艺考负责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现象依旧比较严重,有不少高校艺术专业教师、艺考考官从事艺考培训工作,与报考学生关系非常密切。

要确保艺考公平,让真正有能力者被高校录取,还艺术一方净土,就必须铲除艺考腐败。要实现这一点,聘请胡歌当艺考考官、严惩收受好处的艺考考官等做法只是治标,最关键的还是要改革高校艺考制度,依靠阳光招考堵住艺考制度漏洞,让艺考“黑幕”无处可藏。

首先,必须斩断艺考考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利益链,以法律法规和制度形式明确禁止高校教师从事艺考培训工作。高校教师要想从事艺考培训工作,那就必须离开高校教师队伍,二者只能选其一。其次,打破艺考考官的封闭圈。高校要逐渐减少本校教师担任艺考考官的比例,特别是本校从事艺术专业教学工作的老师,要退出艺考面试工作,扩大外校教师和社会上的艺术人才担任考官的比例。最后,让艺考面试环节更加透明。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高校艺考面试环节除了全程录像外,还可以尝试公开被录取考生的面试录像,甚至直播考生艺考面试,以接受社会大众和落榜考生的监督。

图说世相



母亲“举报”儿子是真爱

高婆婆是一名老党员,她儿子是县交通局二级单位的一名干部。听说儿子准备正月初七宴请朋友,且可能使用公款招待,于是,高婆婆主动劝阻儿子,但感觉儿子并没有听进去,她一大早来到县纪委反映,请求县纪委提前给儿子敲警钟,防止儿子违纪。

2月15日《湖北日报》

一个又一个违法违纪案件一再证实:很多违法犯罪人员都是从不起眼的小问题开始沦陷,逐渐发展成为大问题。很多贪官污吏在悔过时都说:“如果得到及时提醒、能够及时收手,也不至滑向深渊。”母亲举报儿子是对儿子当头棒喝,值得点赞。 李方向



漫画 陶小莫

随感杂谈



讲究点礼数

王梁

近日播出的央视诗词大会上,点评嘉宾提到了“屠苏酒”,说这是古代合家欢聚的饭桌上,唯一由年少者饮的酒,其间含有“少者得岁,老者失岁”的寓意,由此可见古人是极为讲“礼”的。

闹完元宵,年才算真正过完了。春节是中国最隆重、最漫长的传统节日。在各种传统习俗的背后,我看到了一个关键词——礼数。想想也是啊,年夜饭、做祭祀、发红包、走亲访友、迎来送往,都是为了表达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包括先人和仙人)的礼数。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礼也成为民族心理结构和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这些年,大家都感叹年味越来越淡,越来越没有小时候的那份浓酽,这里面除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给我们带来生存样态的变迁外,人们对包括春节在内的各种传统礼数的淡漠、敷衍和无所谓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记得儿时,很多过年仪式都很隆重,而如今,像我家中,除了年过七旬的老母亲还在大体上坚持仪式的老规格外,我们这一代中年人都已经在这些活动上草草了事了,觉着太麻烦,没意思,更遑论那些90后、00后的小辈了。

说起来,有些过年的礼数或者说习俗确实该遭淘汰,比如“开门炮”之类的,但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相当多的内容,还是应被继承和发扬,当然可以在表现形式上与时俱进。比如说旅游

过年、在酒店吃年夜饭、短信送祝福、视频拜年,以及层出不穷、丰富精致、新潮鲜艳的年味年货等,其间流淌的依然是血缘亲情、人际联络,呈现的依然是欢乐祥和、喜庆热烈,讲究的也还是礼尚往来、尊老爱幼。

至于拜年送什么礼,红包放多少钱,七亲八眷该如何称呼,可能很多人都对此伤透脑筋,这时候,讲礼数还要靠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以及存乎于人的情意心念。某年正月,我岳父第一次去我乡下老家,顺带还去了我几个姐姐的家。其间,岳父一直被尊为上宾。大家都是好酒好饭招待,岳父也十分高兴。最后一站去我二姐家,告别的时候二姐夫奉上他特意去酒厂买来的一坛上好绍兴黄酒作为礼物敬赠我岳父。给第一次到访的长辈回礼,我这个做女婿的没想到,好在有二姐夫帮我打点,我真是无比感激他的用心良苦,我岳父也是感到很有面子。

礼数是一种纽带,维系着人际关系。人与人交往,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最怕就是失了礼数,这不仅可能导致双方的关系渐行渐远,而且容易授人以话柄,被街坊四邻、亲朋好友长久数落,自己也往往心有不安。因此,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平常日子,我们都要做个有心人,有些仪式感,不可太过自我与随意,凡事心诚情真,礼数自然就周到了。

是否“强行结扎”的真相只有一个

王军荣

原籍云南昭通镇雄县的胡震已将户籍迁至四川省,但在2月8日回云南镇雄老家过年时,被镇雄县罗坎镇计划生育小组工作人员带到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强行结扎。但2月14日,镇雄县外宣办主任熊涛回应澎湃新闻新闻称,罗坎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并没有强制结扎,系工作人员做思想工作的基础上男子自愿做手术。

2月15日澎湃新闻

胡震和镇雄县外宣办的说法截然不同,疑点不少,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是,究竟是“自愿”还是“强制”?胡震的核心词是“强制”。而胡震展示的照片中,他身上有伤,这似乎可以证明胡震是被强制结扎的。不过,仅凭这一点显然不行,这需要权威的调查结果。

2015年新修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育龄夫妻自主选择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删除了原来关于上环、结扎和查环查孕的有关规定及相应处罚。该法第19条明确规定:“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第20条更是再一次强调,“育龄夫妻自主选择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显然,法律并未规定节育措施可以被强制执行,结扎手术应当在保证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实施,在当事人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应当采取强制措施。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是否“强制”显得至关重要。

真相并不复杂,真相也只有一个。如果当地职能部门的确存在“说谎”,则需要追究相关责任。其一是违法,其二是对公众说谎,两者皆不是小事。